

比较政治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高奇琦

比较视野下的 政党组织—成员形态研究

张冬冬 / 著



Types of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Member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3
第三节 研究假设	15
第四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17
第五节 研究意义	26
第二章 政党类型与成员类型	32
第一节 政党类型的界说	32
第二节 政党与党员:党员的政治价值	50
第三章 成员规模和组织结构的变量 I:政党初始形态	64
第一节 “理性人”政党与组织学路径	64
第二节 回归迪韦尔热:政党起源与初始形态	71
第三节 迪韦尔热的分析要素:组织结构与成员结构	81
第四节 成员规模和组织结构的变量 I:政党起源与初始形态	86
第四章 成员规模和组织结构的变量 II:政党的渗透程度	95
第一节 政党与国家、市民社会关系的研究	95
第二节 政党与国家、市民社会关系的理想类型	107
第三节 政党的渗透程度:党员数量和外围组织	121
第四节 成员规模和组织结构的决定要素	128

第五章 选举政治下政党组织—成员关系模式分析：美国、英国

.....	136
第一节 登记制、代议政治与选举精英型政党：美国政党.....	136
第二节 集体入党、组织与选举群众型政党：英国工党.....	149

第六章 一党执政下的政党组织—成员关系模式：新加坡、中国

.....	162
第一节 邀请制、干部培养与议会精英型政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	162
第二节 申请制、组织渗透与群众动员型政党：中国共产党.....	172

结语 政党组织—成员结构的比较分析.....	186
------------------------	-----

参考文献.....	191
-----------	-----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政党是现代政治中最为重要的政治组织,可以说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然而,在著名的政党学者约瑟夫·拉帕隆帕拉(Joseph LaPalombara)看来,“今天的政党已经和几十年前的政党完全不一样了”¹。那么,当今的政党和早期的政党有了怎样的不一样? 2006年,在一项针对欧洲政党的研究中,学者们对欧洲各国主要政党的党员数量变化情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结果显示,在这些欧洲国家中,除了西班牙以外,其他国家的党员数量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以英国为例,“1998年的时候,英国工党共有党员40万,到2005年时已经下降到20万,党员数量减少了一半;英国保守党党员人数最多时曾超过250万,但在2005年统计时却只剩下25万。英国自民党也没能逃脱党员数量下降的命运,1983年时,自民党的党员人数达到15万,而在2005年时,却只剩下7万多人”²。从英国主要政党来看,各党的党员人数都下降了一半以上,保守党更甚,其党员人数减少了90%。从而我们看到,在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政党中成员数量正在不断减少。这种减少在20世纪80年代仅仅表现为稳定的党员数目同不断增大的选民数目的比重(即党员密度)的降低,但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直接表现为党员绝对数量的下降。³党员数量急剧下降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各政党在选举中支持性选民数量的急剧下降:一个基于五国的调查显示,在相同的教育和经济背景下,党员相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总是更有可能去投票。⁴彼得·梅尔(Peter Mair)关于选民中党员比例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各国选举中,选

民中党员的比例已经从 14% 下降到 5%，即将近一半以上的党员在选举中都不再活跃，不再是政党支持性选民的主要构成群体。⁵也就是说，对于以选举为主要职能和任务的西方现代政党来说，党员数量的减少使其在赢得选举的过程中遭受到了巨大的危机。

另外，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近 2 000 万党员的大党，在一夜之间就崩溃瓦解，不能不让人深思，作为一个拥有如此众多数量党员的大党，党员对于政党是一种什么样的角色与功能。政党作为一个组织，具有所有组织共有的一切特征，而正是由于党员作为政党的基本组成要素的存在才使其成为一个组织。作为政党基本要素的党员，在政党的产生、发展和衰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政党来说，党员作为其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对党员的招募和管理、对党员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以及由此形成的政党的规模与形态，不同政党也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在革命年代为了推翻旧政权和外来侵略者的使命而诞生的政党，在艰苦的革命年代环境下，其发展成员的标准就相对来说较为严格，注重党员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性，注重党员对于党组织的纪律的遵守和对党的绝对忠诚，从而发展出来严格的党员申请制度，要求党员首先认同党的意识形态，在党组织长期的考察和锻炼中才能成为合格的党员，对党员的严格要求和体制外产生的特征使得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群众型的革命政党。诞生于英国殖民统治中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其追求的则是在选举过程中实现长期一党执政，该党党员分为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其中干部党员的吸收采取邀请制，主动吸纳社会知名人士进入党的核心成为干部党员，从而保持人民行动党在国会中的席位，以赢得选举和保障行动党制定政策的通过和执行。而美国的民主和共和两党，则产生于议会政治的过程中，是一种“内生党”，其追求的是在两党竞争中尽可能多地争取选票，因而两党都没有严格的入党程序，只需在选举前登记为某一政党的选民即可自动成为该党党员，且可以随时抛弃党员身份或在投票中不投自己所在的政党。可以说，美国的政党是一个“没有党员的政党”。西方多数政党也大抵采取不甚严格的党员招募方式。另外，与中国共产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不同的是，美国的政党也没有严密的从上到下的组织体系，基本上是一种松散的、分权的组织形态。

那么，政党作为当今政治中最重要的组织，为什么有的政党要招募

大量的普通党员,而有的政党则仅仅需要很小部分的核心党员?作为组织关键要素的党员,其作为组织化的个体,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政治价值和作用?庞大的党员数量对于政党来说是竞选资源、象征性资源,还是支持性资源?除了各国的政体和国体不同之外,是否存在着某些决定因素,使得政党在发展的过程中选择不同的党员规模和组织形态?

从功能来看,作为现代政治生活中最主要的组织载体,政党承担着很多的功能,但“无论是革命性政党还是议会民主性政党,执政才是政党从事政治活动的最高形式”⁶。对于政党来说,“获得并巩固其执政地位必然构成其行动的首要目标,也是政党维持其生命的基础所在,现代政党的所有政治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围绕这一目标展开”⁷。政党是使民主成为可能的必要的组织和领导制度,政党追求执政的过程就是追求权力的过程。政党的主要特点是“通过提名候选人并使他们通过选举进入政府,从而实现对政府的控制功能,它的目标是通过赢得选举获得权力”⁸。政党在追求执政的过程中,“从组织形态上讲,最好能兼具人力密集和资源密集的双重特点”⁹。从而,我们的问题就可以转化为:什么样的党员规模和组织形态对政党获取或维持国家权力是更为有利的?本书选题为“比较视野下的政党组织—成员形态研究”,就是想要探讨在当代政治生活中活跃的各种类型的政党,对于实现各自不同的政党目标——通过革命获得政权、通过选举获得执政或巩固执政地位,对作为政党基本活动细胞的党员有着什么样的要求,即不同的政党需要怎样的党员规模和组织形态:是数量巨多、组织严密,还是数量较少、组织松散,抑或是数量多、结构散?我们的预设是:不同的政党类型,基于其产生之初的际遇不同,其对政党组织建设的重视程度也不同;随着政党对国家政权的掌握,政党想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程度不同,就需要不同的党员规模 and 不同的组织严密程度。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一、政党研究文献梳理

关于政党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和

理查德·冈瑟(Richard Gunther)在2012年出版的《政党与民主》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自1945年以来,(西方)仅关于欧洲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各类已出版的文章、专著和书籍就已达11500种。¹⁰这些研究基本可被归为三类:一是对单个政党或者某个国家中的政党进行的非比较的、专著性的研究;二是跨国的政党比较研究,但也主要集中在一个地区中;三是与政党相关主题的专门系列的严谨的比较分析,但是也局限在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通常指西欧和北美)。¹¹戴蒙德和冈瑟认为这些丰富的文献无论是在实证上还是理论上都对政党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以往的这些研究关注的仅仅是有限的地理区域,如仅仅是一个国家中的单个或多个政党,或者是一个区域中的政党,这种地理区域的局限阻碍了政党学者对政党更为广泛的、实证的研究,而对所有形式的民主政权——不管是新兴民主政权还是成立已久的政权——进行研究,对政党理论和比较政治都是十分有益的。在戴蒙德和冈瑟的《政党与民主》一书中,两位作者认为该文集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并不是局限于关注某一个特殊的地域,而是包括了“对一系列民主制度的实证研究,例如西欧、东欧、拉美、日本、印度和土耳其等”¹²。

对于国内学界来说,关于政党的研究也不在少数,可以说包括政党的各个方面。笼统来讲,国内对政党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对国外专著的翻译,诸如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的《寡头统治铁律》、乔瓦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政党与政党体制》、让·布隆代尔(Jean Blondel)的《政党与政府: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与支持性政党关系探析》和《政党政府的性质:一种比较性的欧洲视角》、阿伦·李帕特(Arend Lijphart)的《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1945—1990年27个国家的实证研究》等等。近些年又有史蒂芬·E.弗兰泽奇(Stephen E. Frantzich)的《技术年代的政党》、拉里·戴蒙德和理查德·冈瑟的《政党与民主》、艾伦·韦尔(Alan Ware)的《政党与政党制度》、安格鲁·帕尼比昂科(Angelo Panebianco)的《政党:组织与权力》等著作陆续被翻译过来,为了解西方政党理论研究的进展和促进国内政党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是国内学界对政党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国外研究基础之上对政党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如郭定平的《政党与政

府》、周淑真的《政党政治学》、陈红运的《政党组织学》、祁利刚的《政党民主论》、王长江的《政党论》和《政党政治原理》、田润宇的《政党角色论》等,主要为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对政党理论的理解和著述;(2)关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和共产党执政能力的研究,如林尚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新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著作,陈蔚的《政党—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研究》等等;(3)对国外政党发展的介绍和比较研究,主要有林尚立的《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李路曲的《当代东亚政党政治的发展》、柴尚金的《变革中政党:国内外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崔桂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防范执政风险研究》、刘仕平的《世界主要国家政党政治发展历程研究》、钱文华的《美国两大政党组织结构研究》、任军锋的《超越左与右? 北欧五国政党政治比较研究》、杨云珍的《当代西欧极右翼政党研究》、于洪君的《当代世界政党文献》、高奇琦的《国外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以欧美和东亚为例》、康学同的《当代拉美政党简史》、李金河的《当代世界政党制度》、王存福的《社会结构变迁与政党嬗变的向度分析: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为例》、梁琴的《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孙洁的《英国的政党政治与福利制度》、徐锋的《当代台湾政党政治研究》、王学东和张文红的《中国共产党和欧洲左翼政党的发展》、顾俊礼的《欧洲执政经验研究》、吴国庆的《法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王家瑞和于洪君的《当代世界政党文献》、孙景峰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以及刘淑春、李兴耕、高晓惠、曲延明的《当代俄罗斯政党》等。

二、研究内容的综述与评价

上述国内外政党研究文献包括各个方面,从本书研究政党组织—成员形态的角度而言,需要从政党功能、政党组织形态分类、政党与党员关系、政党是否衰落等几个方面对现有文献作进一步梳理。

1. 政党的功能

政党具有不同的功能,学界对此有过很多论述。在经典政党理论家萨托利看来,政党具有参与、竞选、整合、综合、化解冲突、录用、决策

和表达这些功能。但是由于不同政党产生的环境不同,因而在政党的这些不同功能中,有些是可以替代的,有些是多变的。经过分析,他认为参与、竞选和表达功能是不可替代的,且在这三者中,表达功能是优先度最高的。¹³从萨托利关于政党功能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党作为一种在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组织形态,可以简单将其功能分为内部和外部功能。内部功能就是指政党作为一个组织其内部的组织功能,如党员的招募、政党的组织管理等等。外部功能就是萨托利所说的政党同国家、社会之间发生关系时所发挥的功能,如参与和表达功能等,而表达功能是优先度最高的,即政党最主要的作用是公民利益的代表。冈瑟和戴蒙德则认为政党所扮演的核心功能主要是精英录用。在精英录用里,包括两个截然不同的选举阶段,这些截然不同的阶段就构成了政党在整个政治生活中七种不同的功能,包括:(1)候选人提名;(2)选举动员;(3)议题构造;(4)社会代表功能;(5)利益整合;(6)形成和支持政府的功能;(7)社会整合功能。¹⁴在政党成员和政党的关系上来看,涉及更多的是政党的内部功能,但是这种内部功能一旦形成,就会对政党的结构产生作用,从而也会影响到政党在国家和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变化,即内部功能能够影响外部功能。

就政党内部功能而言,不同类型的政党对党员的招募和管理也是不同的,在此方面学界尚未有专门的论著,只是少量地、散落地出现在关于政党的研究中。从国内来看,对政党党员与组织进行研究的主要著作是王奇生教授的《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该书着重将国民党对党员的招募和管理进行了研究,认为国民党与共产党同属列宁式政党,但是国民党对于组织建设的失败导致其最终的失败。《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是国内学术界对于政党内部组织结构和功能进行研究的最为重要的著作。其他学者对于政党组织结构和政党成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关于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与执政之后的组织建设和构成的研究。譬如《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一书,着重通过对山东抗战档案的查阅,对党在抗战时期的组织形态从实践上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党员群体和干部群体的社会组成、新党员的吸纳机制和干部类型及其相互关系等组织内部建设的相关内容。¹⁵另外就是大量关于中国共产党招收和管理党员的文件和标准的研究,以及对

新时期党员队伍建设的研究,等等。¹⁶

以上关于政党功能的研究,更多的是以自由民主选举制度下的政党为对象,而忽略或者没能把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党纳入研究范围,表现出一种“欧美中心论”的特点。我们大致可以概括出,政党在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功能有很多:对于自由选举民主政治下的政党来说,提名候选人、大众动员、利益整合和竞选公职等是其发挥的主要作用,也就是围绕着如何赢得选举所承担的组织功能;对于一党长期执政的制度下的政党而言,由于有着如何保证政党自身能够长期执政的压力,政党更多承担的可能是有关社会利益的整合功能,即保证在一党执政体制内利益众多的民众通过何种方式和途径参与政治发展的进程,这种政治参与是在政党的引导下呈现一种可控的稳定状态;而对于处于革命环境下的政党而言,夺取政权就是其唯一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政党更多地运用自身的组织力量,将民众拉入政党组织中来成为政党的力量和资源,从而为夺取政权奠定人力和组织基础。

2. 组织与党员:政党是否衰落

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的重新分化使得政党存在的阶级基础发生巨大变化。“在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衰弱,第三产业、知识经济迅猛发展,导致传统工人大幅减少,科技、管理、办公室人员等所谓‘白领’阶层不断扩大,这使得传统左右翼主流政党据以依靠的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力量格局被打乱。”¹⁷以英国工党为例,原来以蓝领工人为主要群众基础的工党受到了巨大的生存威胁。在布莱尔担任工党领袖之前,工党党员人数大量减少、党员老龄化严重证明了其存在的巨大危机。“如何继续保持自己的吸引力和社会动员力,有效地解决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传统政党政治疏远的问题”¹⁸成为英国工党面临的一个难题。总体看来,英国工党在选民问题上的困境也是当今西方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面临的难题。“在单纯的阶级选择已不可能赢得多数的情况下,如何同时代表、拢住、整合利益取向和政治观点既差异巨大又游移不定的社会群体,如何同时获得地方产业蓝领、白领工人、组织程度差的零工、养老金领取者、自由职业者、服务业和IT业的新中

间阶层,以及工商界企业家最大限度的支持,如何提高非政治化倾向和政治极端化倾向同时强烈发展的青年人的支持率,使自己持续获得存在、发展和执政的合法性,就成为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重大课题。”¹⁹

党员数量的下降对政党组织意味着什么?米歇尔斯通过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研究,认为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大,政党的组织结构将更加复杂,权力也更集中于全国层面的党的委员会而非党的基层组织。²⁰布隆代尔也认为随着政党的发展,政党需要更多的次级组织和干部去组织和管理众多的党的基层组织。²¹帕尼比昂科在米歇尔斯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反的论证,认为单纯的党员数量的增减对政党组织结构复杂性和权力的集中以及政治参与并无影响。²²亚历山大·C.谭(Alexander C. Tan)经过比较丹麦和英国6个政党组织的党员及其组织结构,认为随着党员数量的下降,有些政党的组织复杂性和权力集中程度确实降低了,如丹麦社会民主党,但是其他研究中的对象则不明显。他将原因归结为该政党与其他政党相比的最初规模和结构的复杂性、是否有来自国家的财政补贴等因素。²³苏珊·E.斯格罗(Susan E. Scarrow)在研究关于英国工党、保守党、德国社民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如何利用变化了的环境对党员进行动员中,认为党员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以及党员相对于选民的密度都有了很大的下降;但是对于英国工党、德国社民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来说,政党并没有放弃党员作为选举和合法性来源的优势,而是根据选举环境的变化进一步挖掘党员的作用,从扩大组织的兼容性、去集权化和增强政党领袖同普通党员的接触这三种组织创新方式,保持党在选举中依然能够依靠党员优势来获得选举胜利。而对于英国保守党来说,缺乏在这些方面的组织创新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1953年到1993年期间保守党几乎一直是执政党。²⁴也就是说,从学者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政党党员数量在大量下降,但是政党并没有衰落。此外还有大量关于政党衰落的研究,尤其是美国政党是否衰落的研究。

3. 政党组织形态的分类

对于国外政党研究来说,有关政党分类的研究和方法大体上可以

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在政治谱系上或多维政治坐标中确定不同政党的相对位置来定位政党的性质,另一类则关注在政党发展史中出现的不同政党组织形态,通过区分不同来对政党进行划分。政治谱系的划分方法主要是早期的政党研究者提出的左与右、激进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以及革命与改良的分类方法;这种分类一度非常盛行,至今仍在一定范围内沿用,尤其是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所重视。政治坐标划分法主要是基于强调政党起源对政党类型的影响,强调政党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使得政党在政治谱系上的坐标不同,是属于政党分类的传统型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塞勒(Daniel Louis Seiler)所主张的政党与社会分野的联系性理论以及冯·拜梅(Von Beyme)的“精神家族”分类学框架等。

而关注政党发展史中出现的不同政党组织形态,对政党进行类型学分析,则有四种不同的路径——组织学、功能主义、历史主义和整合主义²⁵,其中前两种为传统的政党类型学研究路径,后两种为新的发展。

(1) 组织学路径。组织学路径沿袭了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将政党视为根据外部环境变化而进行变化的、关注自身目的性的理性计算工具,即社会处于没有完全被动员起来之时,政党只是精英阶层的活动。随着选举权的产生,大量廉价劳动力出现时,政党就转变为依靠大众动员组织起来的形式,即大众型(或群众型)政党就产生了。然而,当劳动力的成本过于昂贵时,政党就会转向发达的大众传媒和专家团队的竞选模式,从而放弃了传统的大量党员的竞选模式,进入政党的卡特尔模式中。从这种组织学路径上对政党进行研究的主要有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帕尼比昂科和基奇特(Herbert Kitschelt),²⁶其划分标准经常定位于政党的组织结构组成部分,包括政党组成成员结构、政党有无完整的组织体系、政党的权力掌握在政党的中央还是基层组织、政党组织对国家和社会的渗透和扩散等。²⁷

(2) 功能主义路径。功能主义的视角是将政党作为公民与国家、政府之间的一种联系工具,一种具有一定政治参与和政策制定的功能的工具,注重的是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所发挥的不同功能,或者政党所要追求的目标和完成的任务的不同而表现出来的不同作用。其中,

“政党的功能体现在政党与其所处社会整体机构的互动之中。政党与国家的互动使得政党的政策实施成为其功能,政党与社会的互动使得政党的代表选民成为其必要,政党与政府的互动使得政党的占据公职成为其需求”²⁸。从而可以看出,政党的存在是因为其有用性,这也暗示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环境背景下,政党所发挥的具体功能是有差别的,而不同的政党可能承担的功能也会是相似的。

(3) 历史主义路径。历史主义路径认为政党的发展从其历史演进来说,表现为一个持续的、渐进的过程,即从党员数量较少、以核心会议为中心的精英型政党,到党员数量众多、组织完整和意识形态明显的群众型政党,然后再发展到面向社会中大多数成员的全方位政党,随后政党与国家相结合成为卡特尔政党,以及再后面出现商业新型政党。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主义试图发展一种“线性的通则解释”²⁹,这种通则解释描绘了一幅从精英型政党到新政治型政党的政党发展变革图。同时这种通则解释中又包含了每个阶段不同政党类型的独特之处,反映了政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政党组织形态,是从政党发展史的角度对政党组织形态的一个系统的、连续的分类。

另一位从历史主义角度对政党类型进行阶段划分的是萨托利。萨托利在更正了迪韦尔热干部党与群众党的区分后,认为“只有那些没有组织的政党才能被排除在(群众型政党)之外”³⁰,从而在他看来所有的政党都是群众型政党,只不过属于不同的亚类型,且这些亚类型之间是有转化和发展的可能性的。

(4) 整合主义路径。除了组织学路径、功能主义路径和历史主义的路径之外,还存在一种将上述几种整合在一起的政党类型学,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有些学者认为基希海默尔甚至是不加区别地将各种政党类型学划分整合在一起,并提出自己的政党类型“四分法”:个体表达型政党、阶级群众型政党、宗教群众型政党和全方位人民党。³¹在高奇琦看来,整合主义的路径包括两种,一种是整合组织学和功能主义这两大传统路径,另一种则试图建立历史主义与组织学的二维分析框架。³²第一种整合路径,即将组织学和功能主义整合在一起的学者主要是沃林茨。他主要是将自己的组织学视角下的政党类型学划分建立在功能主义的基础上,从而提出追求政策型、

追求选民型和追求公职型为功能主义分类的三个维度,然后把以组织学分类为基础的这些政党类型放在三维结构图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囊括迪韦尔热干部、群众型政党,还包括全方位、卡特尔和新政治政党的新的、复杂的政党类型学划分。第二种整合主义的路径主要是戴蒙德和冈瑟所提出的,他们主要从历史主义和组织学的二维视角来进行研究。戴蒙德和冈瑟认为他们的划分法并不是要提出或增加一些新的政党类型,而是根据其他学者以前发现的模型和术语,同时提出一些最常用的作为政党类型学基础的标准的秩序类型。³³他们的方法在于将所有的政党模型系统地置于一个综合框架内。首先,戴蒙德和冈瑟基于历史主义的角度,将历史上曾经出现和依然存在的政党分为五大类型——精英型政党、大众型政党、种族主义政党、选举型政党和运动型政党,这五大类型为他们进一步划分的“属”;并以这五个“属”为基础,进一步定义了15个不同的政党“种”,其中每一种依次属于一个更广的政党类型“属”,诸如精英型政党包括传统的地方显贵型和庇护型政党,选举型政党包括个人魅力型、全方位型和纲领型的政党等等。³⁴他们又从政党目标、竞选策略、组织化结构和联系、社会基础等四个方面对15个不同的子类型进行了详细的区分和描述。戴蒙德和冈瑟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是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政党类型分析“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对非欧洲政党进行了大量关注,包括原教旨主义政党、种族主义政党、民族主义政党等等;二是详细的划分和类别几乎可以囊括世界上存在的所有政党,能够更好地反映现实世界中政党的多样性。但这也是他们研究的问题之所在,因为过于详细的划分不仅复杂,而且在理论上进行概括和适用是不可能的。³⁵

(5) 国内关于政党组织形态的研究。国内关于政党组织形态的研究主要基于在西方政党形态研究的基础上,对西方政党的形态进行类型学划分的介绍和评价,主要集中在张小劲、李路曲、高奇琦、徐昕、胡小君、卢文华、徐锋、周建勇、胡伟等学者的研究中。其内容主要是对西方学术研究的编译、总结,以及在中国语境下的运用,比如从对政党类型学的研究来看政党与国家、政党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国的政党—国家关系、政党—市民社会关系应该是何种模式。

国内学界基于政党组织形态对政党类型的研究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对政党组织形态的类型学的整体研究。对政党组织形态的类型学的整体研究,主要集中于张小劲、李路曲、高奇琦、胡伟和孙伯强等学者。张小劲是国内学界最早对政党形态的类型学进行关注和研究的学者。在其研究中,张小劲对西方政党形态类型学(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介绍,为学术界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³⁶随后,李路曲对西方政党形态的类型学划分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并对导致西欧政党发生变化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和探讨。³⁷高奇琦在其《国外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以欧美和东亚为例》一书中,通过对国外政党类型学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对每个类型之下政党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和研究,并提出对中国共产党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借鉴意义。³⁸胡伟和孙伯强则是在借鉴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和彼得·梅尔关于政党模式理论的基础上,分别从政党与市民社会及国家之间的关系、政党在选举竞争中的特征和政党组织体系内部特征等三个维度,对干部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全民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的模式嬗变进行考察和分析,进而得出政党发展的某些规律性内涵,即西方政党模式嬗变是多种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社会结构、选民的政党认同、市民社会、政治沟通技术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是其基础动力,选举制度、政党体制、政党竞争等政党政治规则系统的直接构成因素的变化是其中介动力,而政党和政党领袖的行为以及政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等内部因素则是其直接动力”³⁹。

第二,对政党形态发展某一阶段较为重点的研究。对政党形态发展某一阶段较为重点的关注,主要是侧重于对新型政党的研究,譬如对卡特尔政党、全方位政党的研究等,主要学者有徐昕、徐锋、周建勇等。徐昕对最新出现的“卡特尔政党”进行了研究和评价,认为卡特尔政党的出现是伴随西欧社会和政治环境变化的必然,而政党组织形态的嬗变也是不可避免的,对我国政党的发展也是有借鉴意义的。⁴⁰徐锋认为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特别是政治生活的新变化,政党内部人员、技术和机构等诸要素结成的有机系统就会出现显著的变化,政党组织这种对内外环境变化作出整体调适的结果就成为政党组织形态的变化。他在对西方历史上出现的核心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和全方位政党进行研究后提出,政党作为介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团体,它的自身形态的变

化始终取决于包括目的、方式和技术手段变化在内的社会交往的变化。⁴¹周建勇在分析政党转型的卡特尔类型后,从政党的目标、政党制度化的程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及领导人的变动和自主性四个方面对政党转型的原因进行了分析。⁴²

第三,对欧美政党发达国家之外的政党类型进行的划分。对欧美发达国家之外的政党类型的关注,主要体现在胡小君和卢文华两位学者的研究中。他们将视野放在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形态上,通过对政党组织结构的完整性、政党的产生方式、运作模式,以及权力精英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把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分为议会型精英党、意识形态型精英党、权力型精英党、参与型精英党、控制型群众党、依附型群众党等六种政党形态。并认为在精英党和群众党之间、不同形态的群众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组织继承与变异的关系,而且参与型群众党成为发展中国家主流的政党形态。⁴³

国内其他政党研究的学者,则较少涉及此方面的问题。总体来说,国内关于政党类型学划分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翻译和评价西方学者及其研究的阶段,即学习西方基于政党组织形态对政党类型的划分,并对不同政党类型进行介绍和概括。

4. 不同政党组织结构形态的差异根源

对不同的政党在组织方面存在的差异以及差异的根源进行考察时,大致可辨识出三种主要传统。第一种传统是选举竞争模式,这一模式在迪韦尔热的《政党概论》和爱泼斯坦(Leon D. Epstein)的《西方民主国家中的政党》的经典研究中得到很好的说明。在对民主化早期阶段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类型的政党组织作出解释之后,这种方法强调来自其他政党的竞争对推动政党采纳某种组织类型所起的作用。在有关哪种结构对政党最为适宜的问题上,迪韦尔热和爱泼斯坦的观点大相径庭:迪韦尔热认为以西欧社民党为代表的左翼群众型政党是未来政党发展的主流模式,未来政党结构形态会出现“自左向右的蔓延”⁴⁴;爱泼斯坦则认为美国式松散的、党员数量较少的精英型政党(干部型)是未来政党的主流模式,美国政党不可能出现西欧社会那样的“有责任的政

党政府”⁴⁵。但在有关竞争性政治逻辑的作用问题上,两人看法极为相似,都认为竞争性的政治逻辑对政党组织形式产生影响,即不同的竞争制度导致政党组织形态的不同,美国独特的政治环境和制度使得在美国出现英国式的群众型政党和责任政府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也并不代表美国的政党其效能就是低下的,恰恰相反,美国松散的政党组织形态正是美国环境的产物,是符合美国的分权式宪政体制的要求的。⁴⁶总而言之,选举竞争模式争论这样两个问题——政治发展的主要形式是群众型政党还是精英型政党?群众型政党还是精英型政党能更好地代表选民的意见?

第二种是制度模式传统。与选举竞争模式相比,制度模式非常重视一个组织得以形成的动力以及政党内部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并不否认竞争选票的必要性可以推动政党变革或调整其组织结构,但它强调各党在产生之初的政治形态对政党后来的组织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论述这种传统最杰出的著作当属迪韦尔热《政党概论》和帕尼比昂科的《政党:组织与权力》。迪韦尔热和帕尼比昂科认为,政党起始之初的政治竞争环境对政党以后的组织建设和组织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体制内(议会)生成的政党倾向于建立组织结构松散和党员数量较少的组织形态,体制外产生的政党则多是组织结构严密和数量众多的形态。⁴⁷政党产生之初的组织形态可限制政党向一种唯一的、最适宜的组织形式趋同的可能性发展:“政党的诸组织特征更多地依赖其历史,即依赖于组织是如何起源如何巩固的,胜于依赖其他因素。事实上,政党的诸起源特征有可能在数十年后还对该党的组织结构施加影响。”帕尼比昂科承认政党初始形态对政党组织结构的决定因素:“政党形成理论不可能超越迪韦尔热的内生型(议会内)政党和外生型政党的区分,前者由既存的议会精英们创立,后者由‘非政治化的’诸集团与协会创立。因为对大量政党起源的历史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这一古老的区分也只有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需要。它首先未能考虑那些拥有同类起源(内生或外生)的政党的组织差异:源于议会内的政党产生了多种结果,类似地,源于议会外的政党组织(迪韦尔热认为主要是群众型政党)的差异也非常巨大。”⁴⁸即帕尼比昂科认为仅仅从政党产生之初有无内在的合法性,无法对同属内生或外生的同一类型的政党